



文献家朱熹： 朱熹著述活动及其著作版本考察

A Philologist Zhu Xi:
Research into Compiling Activities and Scholarly
Works of Zhu Xi

陈国代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国家社科基金

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

后期资助项目

文献家朱熹： 朱熹著述活动及其著作版本考察

A Philologist Zhu Xi:
Research into Compiling Activities and Scholarly
Works of Zhu Xi



陈国代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献家朱熹：朱熹著述活动及其著作版本考察/陈国代著. —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.6

(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)

ISBN 978-7-303-18379-1

I. ①文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朱熹(1130~1200)—人物研究②朱熹(1130~1200)—著作—版本—研究 IV. ①B244.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5572 号

营销中心电话 010-58805072 58807651

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<http://xueda.bnup.com>

WENXIANJIA ZHUXI

出版发行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<http://www.bnup.com>

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
邮政编码：100875

印 刷：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29

字 数：518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68.00

策划编辑：曾忆梦

责任编辑：王艳平

美术编辑：袁 麟

装帧设计：毛 淳 袁 麟

责任校对：陈 民

责任印制：马 洁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：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：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：010-58805079

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

出版说明

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，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，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。它是经过严格评审，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。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，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，促进成果转化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“统一设计、统一标识、统一版式、形成系列”的总体要求，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。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

编辑说明

为行文简略之便，本书按照学界惯例，对引用和提及的著作多使用简称，说明如下：

1. 引自朱熹《朱子全书》之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《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》和《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》者，分别简称为《文集》（为别于续集、别集，亦称正集）《续集》《别集》。

2. 引自黎靖德《朱子语类》者，简称《语类》。

3. 引自张栻《南轩先生文集》者，简称《南轩集》。

4. 引自束景南先生《朱熹年谱长编》者，简称《年谱长编》。

5. 引自时贤成果者，除参考文献著录外，一并鸣谢。

6. 引自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者，简称四库本，只标明作者，书目，卷次，册次，页码。

7. 为方便读者阅读，对引用古籍内容，作者均加以标点。

写在《文献家朱熹》付梓之前

陈国代

莫笑朱君耐寂寥，
青灯子夜乐箏瓢。
文山著履层层上，
学海述经步步高。
楔木版雕三味永，
行商本贩四书挑。
兰台研墨留香韵，
旨意究明致舜尧。

2011年8月9日午后

序 一

“东周出孔丘，南宋有朱熹。中国古文化，泰山与武夷。”(蔡尚思诗)中国文化的这两位伟人，一是儒学与经学的开创与奠基人，一是宋明新儒学——“四书学”的奠基人。在经学文献的整理、诠释与哲学思想的建立与发展上，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孔子述而不作，以述为作，删诗书，正礼乐，笔削《春秋》，晚年好《易》述《易》，为“六艺”或“五经”奠定基础。非孔子，无以建立真正的经学，以奠定中国文化思想的核心；非朱熹，则无以建立新儒学、新经学，使中国文化重获生机，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与核心。朱熹在“四书”的整理、诠释和“五经”的重新整理与诠释上所做出的贡献，付出的辛劳、心血，是无人可以相比的。

《易学》经过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，获得了新的诠释与面貌。

《诗学》经过朱熹的《诗集传》，获得了新诠释，展现了新生命。

《礼学》与《尚书学》，朱熹也在论注上做了大量工作，提出了很多创见，为新解释指明方向。

“四书学”的建立，更是朱熹集一生精力完成的巨大工程。

朱熹是如何在这些关系中国文化生命的经典上兢兢业业，孜孜不倦，一丝不苟，博采众长，综合创新而集大成的？是如何通过文献整理与诠释，以“理一分殊”，融会贯通而建立一新儒学哲学体系的？通过本书的全面系统介绍，读者可得一完整的认识。

经典的生命在于随时发展，在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的一代一代学者的诠释中，为社会与人生提供思想指导。经典文献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整理而更加精准、条理、系统。郑玄在“三礼”的整理诠释上做了基础性的工作。王弼在《易学》的整理、诠释上做了大量工作。杜预在《左传》的整理、诠释上做了大量工作。但到朱熹的时代，好些重要著作，如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其文本仍然是头绪杂乱、面貌不清的。程颐于《大学》作了章节新编，朱熹重新分章分传，并为之文字训诂，义理诠释，使之完备、系统，成为今天仍然采用的定本。本书把朱熹的这一艰巨劳作过程准确地再现出来，可以说朱熹不仅在做学问的敬业精神上为后学作了示范，也为如何从文献着手，以研究与创新中国传

统文化作了有益的示范。《大学》只是一个例子。朱熹的“四书学”及其对所有经典文献的整理，都贯穿着严谨而创新的治学精神与学风。这是我们应该好好继承与发扬光大的。

文献整理，内容十分广泛，版本选择、校订、文字训诂与义理诠释是基本工作。训诂不明，无以使义理明；义理不明，也无以使训诂和文献整理有序而明。朱熹于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之所以费尽毕生心血与精力，不断修改、屡易其稿，盖不惟训诂精准之不易，更由于义理的难明。“义理”不是由文字训诂自然呈现的，是诠释者重新赋予的；既要“照着讲”，又要“接着讲”；既要“我注六经”，又要“六经注我”。两者天衣无缝地恰当结合，融为一体，才能使经典文献所凝结的文化传统展现新面貌，焕发新活力。这需要有超人的见识、深邃的哲思，也需要有广博的学养，扎实深厚的学术基本功与不辞辛劳的付出。陆象山只“六经注我”，“不立文字，直见本心”，讲来讲去只有“心即理”一句话，置儒学经典文献之整理、诠释于不顾，无以担负建立新儒学的任务。宋明新儒学是有赖于朱熹的文献整理与诠释工作才得以成功的。朱熹吸收佛禅与道家及汉唐以来的儒学研究成果，综合创新，又特重训诂的严谨，才使经典文献所凝结的民族文化智慧与根本精神，得以依托承传。“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。”中国文化生命之生生不息，在南宋后是由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完成的。《语类》说：“《中庸解》每番看过，不甚有疑，《大学》则一面看，一面疑，未甚惬意，所以改削不已。”^①甚至临死前还修改“诚意章”。如此精勤敬业，正是基于“文不在斯乎”之文化使命之高度自觉。

“四书”形成于不同时代，作者不一。作为一个整体，有无统一的中心思想“一以贯之”？其统一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？是心外求理（道德），积习成性；还是“理具于心”、心性一体、性在心中？朱熹 37 岁前茫然不知所向，“中和之悟”后才恍然大悟。但如何使其贯彻于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每一重要名词与条目的解释，环环相扣，不致散而无统甚或相互矛盾？这不能不使其绞尽脑汁，反复斟酌，并不断与同辈学者研究讨论，集思广益，择善而从。看本书，读者将可以领会朱熹为此所付出的艰辛。

在《论语要义序》中，朱熹说：“河南二程先生，独得孟子以来不传

^①《朱子语类》卷 19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6，第 437 页。为行文简略之便，全书引用某著作时，只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注出版项，以下皆简注为书名、页码。

之学于遗经。熹年十三四岁时，受其说于先君，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。中间历访师友，以为未足，于是遍求古今诸儒之说，合而编之。诵习既久，益以迷眩，晚亲有道，窃有所闻，然后知其穿凿支离者，故无足取；至于其余，或引据精密，或解析通明，非无一辞一句之可观，顾其于圣人之微意，则非程氏之侔矣。”（《文集》卷75）在《论孟集义序》中又说：“《论》《孟》之书，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，古今为之说者，盖已百有余家……然自秦汉以来，儒者类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。宋兴百年……有二程先生者出，然后斯道之传有继，其于孔氏孟氏之心，盖异世而同符也。故其所以发明二书之说，言虽近而索之无穷，指虽远而操之有要，所以兴起斯文，开悟后学者，可谓至矣。”（《文集》卷75）但程颢对“四书”无注解，程颐则仅有《论语解》。朱虽对之特别尊崇，但亦择善而从，关键章句还有尖锐批评，如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程颐注解：“孔子生而知之者也，言亦由学而至，所以勉进后人。立，能自立于斯道也。不惑则无所疑矣。知天命，穷理尽性也。耳顺，所闻者通也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则不勉而中矣。”胡寅说：“圣人之教亦多术，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。欲得此心者，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，循其序而进焉。至于一疵不存，万理明尽之后，则其日用之间，本心莹然，随所意欲，莫非至理。盖心即体、欲即用，体即道、用即义，声为律而身为度矣。”（《论语集注》）朱熹于胡氏注大加称赞，说：“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极好，尽用仔细玩味。圣人千言万语，许多话说，只是要人收拾得个本心，不要失了，日用间着力摒去私欲，扶持此心出来。理是此心之所当知，事是此心之所当为，不要埋没了他可惜。只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至大至小，皆要此心为之。人心自有许多道理，不待逐旋安排人来。圣人立许多节目，只要人剔刮将自家心里许多道理出来而已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23）“人而不仁如礼何，人而不仁如乐何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程颐注解：“仁者天下之正理，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。”（伊川先生《经说·论语说》）朱熹评论说：“程子说固好，但少疏不见得仁。仁者本心之全德。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，则所作为自有序而和。若此心一放，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来，安得有序，安得有和。”（《语类》卷25）直指程颐“不见得仁”。因为朱熹已悟“仁”是天然本有之良心，程颐强调的则是“正理”。朱熹之说本于游酢：“人而不仁，则人心亡矣，其如礼乐何哉；言虽欲用之，而礼乐不为之用也。”（《集注》）“道夫问：‘《集注》举三说，若游氏则言心，程氏主理，李氏谓待人而后行。’曰：‘所疑者何？’曰：‘今观

前二说与后说不相似。’曰：‘仲思以为如何?’曰：‘此正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之意。盖心具是理，而所以存是心者则在乎人也。’曰：‘恁地看得是。’”(《语类》卷25)道夫突出游氏、程氏的区别是心与理的区别。朱熹对道夫的回答则充分予以肯定。

如何释仁?朱熹和张栻进行了多年讨论,并各自写了《仁说》,进行切磋。壬辰年朱熹完成《仁说》,才真正使其《论语集注》能“一以贯之”而呈现一新面貌。对《孟子》,朱熹于63岁时作《读余隐之尊孟辨》,指出孟子所传“道统”,即人所天赋秉有之仁义良心、心体。《大学》的“三纲领,八条目”,“明德”与“明明德”及“格物致知”等关键概念,朱熹以前,从未有实质的解释。朱熹才第一次从心性一体上解为:“明德者,人之所得乎天,而虚灵不昧,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但气禀所拘,人欲所蔽,则有时而昏,然其本体之明,则有未尝息者。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,以复其初也。”(《大学章句》)并代圣贤立言,写《格致补传》,释“穷理”为“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”,“已知之理”为“生而既知之仁义道德之理”,也即“明德”。临死前修改《大学》诚意章文字为:“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,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,而苟焉以自欺者。然或已明而不谨乎此,则其所明又非己有,而无以为进德之基。故此章之指,必承上章而通考之,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,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云。”对《中庸》,朱熹则在60岁时改定其《中庸章句序》,以《大禹谟》“四句话”为指导思想,认为是儒门道统之传授心法。首章“中和”也被诠释为心性一体的文献表现。朱熹61岁时对刘砥说:“某前以孟子‘尽心’为《大学》‘知至’。今思之,恐当作‘意诚’说。盖孟子当时特地说个‘尽心’,煞须用功。所谓‘尽心’者,言心之所存更无一毫不尽。好善便如好好色。恶恶便如恶恶臭。彻底如此,没些虚伪不实。”(《语类》卷60)这段语录正可和《中庸章句序》所说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之旨相印证。

孔子提倡博学、慎思、审问、明辨,说:“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。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“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思,仁在其中矣。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《中庸》讲“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”。《易传》讲“多识前言往行,以蓄其德”。故经典文献的整理、承传、诠释是儒学发展的内在要求。“言而无文,行之不远。”陆学不立文字,未能远传。王阳明稍补其失,写《大学问》及格物致知等“语录”,对《大学》《孟子》进行诠释,但仍力求简易,未脱禅学风习,所谓“天泉证道”——“四句教”：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

物”，滋后学无穷流弊。游谈无根，终激起清代“实学”“汉学”走入另一极端：轻视理性思辨、理论思维、哲学指导，以为训诂明，经义自然明。“人人许、郑，家家贾、马”，虽在文献整理、辑佚与文字训诂上取得很大成就，但经义并未能真明。陈奂的诗学，拜倒于《毛诗序》之下，见识反比朱熹《诗集传》倒退。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，亦以罗列大量材料见长，漫而无统。焦循《孟子正义》、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亦皆如此。清人厌倦宋明心性之学，不知“内圣外王、一体两面”是儒学的特点。“内圣”本质上立足心性，以道德自立自律为基础。赵岐《孟子注》释以汉人功利之说、天人同类之说，偏离了儒学和孟子之真精神。清人重蹈覆辙，劳而少功，终使儒学暗而不彰。对比朱熹所做的工作，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。本书正好为此提供了全面、丰富的材料，弥足珍贵。

今年十一月出席厦门两岸《周易》学术研讨会，会后访问了武夷山朱熹故里与讲学之处。蒙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、武夷学院张品端研究员等热情接待，国代先生陪同访问，并出示其大著《文献家朱熹》，嘱予为序。敬谢不如从命，特草具如上；不惟赞赏推荐，亦希引起学界关注讨论，以推进朱子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。

金春峰

2013年12月12日
北京风度柏林寓所

序 二

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朱子学逐渐成为显学，已走过了 30 年历程。30 年来，研究者不断增加，领域不断扩大，成果在不断涌现。如今，百花丛中又开出一朵新花，这就是陈国代先生的新著《文献家朱熹》。

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史上，朱熹是继孔子之后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儒家哲学的代表人物，是理学的集大成者，也是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完成者。他一生遍注群经，对宋以前的思想学术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。全祖望论朱子之学，有“致广大，尽精微，综罗百代”之言。钱穆先生说 he 不仅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，亦可谓集中国儒学之大成，甚至可称之为集中国学术文化之大成。朱熹思想不仅被作为官方意识形态，统治人们的思想达七百年之久，而且作为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，在中国社会乃至韩国、日本等东亚国家都具有相当影响。

朱熹的历史贡献固然重在思想文化方面，他是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，盛名之下，人们似乎都不太会关注他的文献学。但朱熹在文献学上的长期实践与重大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。他遍读经典，遍考群经，遍注群经，全面而系统地整理传世文献，借助经典诠释，提出学术观点，创建思想体系。朱熹在文献学领域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古书辨伪与文献校释两方面，他一生辨伪之书达五十多种，涵盖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他的辨伪方法和辨伪精神都深深影响了后人。他的文献校释达八十多种，除影响最大的《四书集注》外，还有《诗集传》《周易本义》《楚辞集注》等。他有深邃的学术眼光，指出经学诠释是论道的基础，提出“文势、义理及他书之可证验者”的标准，把古籍校勘的一般原则与文学规律结合起来，都大大启发了后人，丰富了文献学的理论内容。即此而言，我们称朱熹是文献大家，应当是毫不为过的。

近十多年来，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到朱熹的文献学，先后发表了《朱熹〈诗集传〉文献学研究》《朱熹的文献学成就》《20 世纪朱熹文献学

研究述评》等论文，而专著类成果尚稀见，如今，《文献家朱熹》的出版，无疑将填补这一空白。

陈国代是近几年朱子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。他原本学医，从事高校医疗保健工作，在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与学校转型中，转到武夷学院图书馆工作，从此开始了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。风景秀丽的武夷山，是兼具世界自然、文化双遗产的旅游名胜区，是朱子学的发祥地，因而朱子学研究一直是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。为了配合这项研究，校图书馆专门开辟了宋明理学特色书库，他参与了特色书库的建设，把主要精力都用于搜集整理朱子理学资料方面。经过数年的努力，他在大量获取资料的基础上，于2007年整理出版了25万字的《朱熹在福建的行踪》，又于2008年编纂出版了91万字的《朱子学关涉人物哀辑》，蒙培元先生为之作序。2008年，为了学院的学科建设，他又与本院姚进生、张品端先生合作，承担了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的子课题研究，完成46万字的撰写任务，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《大教育家朱熹——朱熹的教育历程与思想研究》。为了普及推广朱熹的《礼》学思想，他还承担了《朱子〈家礼〉与人文关怀》一书的主要撰述任务。

在搜集整理和阅读过程中，他发现朱子著述宏富，版本复杂，头绪纷繁，很想理清线索。有了这个想法，他便开始一步一步地做，一项一项地查，积十年筚路蓝缕之功，终于完成了朱熹文献学的整理研究，形成了三十余万字的著作。其搜罗之全，用力之勤，足令人感叹。

该书是一部自成特色的著作。正如作者所自言，该书广泛吸收前人及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尽可能详尽地再现朱熹的著述活动，帮助读者了解其学术进程。作者对朱熹的文献整理工作作了详尽的梳理，把重点放在著作及版本的介绍方面，把朱熹之后，下及元明清至近现代，都作了延伸解说，读者可从中了解朱子学在历代的流传、传播与衍变情况，这对进一步推进朱子学研究，拓开新的研究领域，是大有裨益的。

全书以汇编朱子文献学资料为主体，但明显超越了文献学资料集的水准。作者分章论述，引《语类》及《文集》所论，分门别类，揭示文献成型过程，真知灼见，时出文中。如第四章第一节论朱子“仿《诗传》作《书传》”意图及《书集传》经朱熹审订未及尽改由蔡沈总成之说，第十

二章第一节论《韩文考异》成书过程等。在诸多的著述活动中，朱熹的主导与核心地位得到体现，朱熹友人张栻、吕祖谦以及朱熹门人蔡元定等人的资助作用也得到反映，从而揭示南宋时期考亭学派、湖湘学派、浙东学派的互动关系。

我与国代早年相识，各地召开朱子学会议，常有谋面交流的机会。今年春，余来武夷，接谈甚洽。稍间，出其书稿，问序于余。匆匆一阅，觉其有物，暇而再阅，感其心力，乃细阅全稿，而为此序云。

吴长庚
壬辰之春序于武夷

引言

中国古代图书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大凡以儒家经典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进行系统地研究、探讨而有建树者称经学家。而研究范畴兼及史部、子部、集部且有建树者应称文献家。以此来判断，朱熹无疑是一位出色的经学家，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献家。笔者多年诵读朱熹著作及其年谱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一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文献建设，于常经求通义，为人类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就文献学而言，笔者认为“明经正道”是朱熹著述活动的终极目标，“精益求精”是朱熹著述活动的治学态度，“文献成型”是朱熹著作的版本之源。

朱熹(1130—1200)生活在政治分裂、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的南宋时期，登南宋绍兴十八年(1148)进士第，历官泉州同安县主簿、知南康军、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、知漳州、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、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。自入官到去世，凡五十年，历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朝，担任地方官九年，在朝四十余日，其余时间则请祠居家，在武夷山下过着讲学和著述的生活，成为思想家、教育家。称朱熹是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分别基于其在哲学方面、思想方面的伟大贡献而言；称朱熹是文献家，是基于其在文献学上的长期实践与重大贡献而言的。鉴于其毕生致力于著书立说，在文献成型学方面有超凡建树，在校勘、辨伪、考据方面亦自成典范，故冠以文献家当之无愧。

朱熹的文献建设是以孔子为榜样的。孔子博学多识，事事理会，且能一以贯之，为万世立言，作千言万语无私意，只是教人做人而已。其理论所包含的就是人道主义哲学，所建立的一套道德规范，旨在扬善、自我完善。孔子55岁被迫离开鲁国，十四年周游齐、卫、宋、陈、蔡等国，拜见很多国君与大臣，人生阅历丰富，而不能尽展才华，没能实现治国安邦的理想，68岁回鲁不再求仕，专心教育事业，统领高徒从事文献整理，删《诗》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《乐》，70岁修《春秋》，系《周易》，以教万民。孔子晚年思想成熟，把两千多年来往圣前贤所言的义理载入典籍，“举其最而言，则《易》之卦画、《诗》之咏歌、《书》之记言、《春秋》之述事，与夫《礼》之威仪、《乐》之节奏，皆已列为六经而

垂万世”。朱熹明确地说：“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，曾经圣人手，全是天理。”^①“六经”的理论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，而这种学说后来成为中国伦理、法律、政治、教育和日常生活的指导法则，成为从帝王到平民都必须遵从的规范。

朱熹认为：“儒教自开辟以来，二帝三王述天理，顺人心，治世教民，厚典庸礼之道；后世圣贤遂著书立言，以示后世。”^②朱熹作为儒教中人物，自感“美质有限，学问无穷”，一生好学用功，特别重视儒家经典文献的诵读与研究，尤其看重文道统一的文献著作，说：“道者，文之根本；文者，道之枝叶。惟其根本乎道，所以发之于文，皆道也。三代圣贤文章，皆从此心写出，文便是道。”^③“道本无形象，须体认之”^④，既可于现实生活中体认，也能于儒家经典著作中汲取，然“圣贤之书，非细心研究不足以见之”^⑤。而天资好的人，恃其行之过，而以道为不足知，天资不及者，又不去讲学，故不明道。朱熹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儒家经典著作的钻研，求道就是“要得人只就读书上体认义理”^⑥，知“义理本平易”^⑦，虚心下气以读之，自然有得。

朱熹秉承儒家传统思想，努力通过书院教育，提升受教育者的素质，进而改变世风。他要求从学者立志为学，而“为学无许多事，只是要持守心身，研究道理，分别得是非善恶”^⑧。他认为通过学习，人人可以克去己私，成为正人君子，同时也认为人人应该成为有道德修养的人，并尽最大努力帮助更多人成为合乎儒家思想规范要求的人。这与古代圣贤的行为一致，“圣人出来做，须有一个道理，使得天下皆为君子”^⑨。朱熹认为儒家经典已经包含如何做人的道理，隆兴二年写信告诉李宗思说，“窃谓圣人道在‘六经’，若日月之明”^⑩，要下功夫穷究，才能为己所有，故说“道在‘六经’，何必它求”，要求士子首先“全

(宋)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11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6，第190页。

《语类》卷125，第2993页。

《语类》卷139，第3319页。

《语类》卷119，第2872页。

《语类》卷130，第3111页。

《语类》卷11，第176页。

《语类》卷61，第1469页。

《语类》卷118，第2852页。

《语类》卷70，第1759页。

朱熹，朱杰人等主编：《朱子全书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43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；合肥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，第1953页。

理会经学”^①。“六经”文字浩博，多数人无法全面阅读、正确理解并掌握其精髓。人若有个大胸怀，也不难弄明白“《易》有个阴阳，《诗》有个邪正，《书》有个治乱”^②的道理。“圣贤千言万语，看得虽似纷扰，然却都是这一个道理。”^③

在南宋社会，人心外慕，漠视儒家经典成为通病，士子不去仔细读书，不去考究义理，却要应举求禄，读时文者成为时尚。好文辞者，又不能做切己用功，不晓得天下道理，不曾识得圣人言语，往往解读失真。朱熹指出：古圣贤言语与后世人言语不同，而当世专做时文底人，不知“仁义道德之说”，只依体式就题目上说去，所言屈曲纤巧，都不关自家身己之事。也就是“今时人不求诸六经而贪时文”，没有找到学问的根源，围绕科举的应试教育，最终后果是“徒然坏了许多士子精神”^④。尽管“时文中亦自有工夫”^⑤，士子也要下功夫才能有所得，多数人只是蜻蜓点水，以浮词博得考官欢喜，敲开仕进大门，过后就忘到九霄云外。朱熹为此感到痛心，要求从学者审慎选择学问与科举，与其耗费大好光阴读时文，不若于天地之常经、古今之通义的儒家经典著作上用功，作扎实的为己学问。“舍《六经》之外，求所谓玄妙之说，则无之。近世儒者不将圣贤言语为切己之事，必于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论，屈曲缠绕，诡秘变怪，不知圣贤之心本不如此。既以自欺，又转相授受，复以欺人。某尝谓，虽使圣人复生，亦只将六经、语、孟之所载者，循而行之，必不更有所作为。”^⑥朱熹曾说：“吾侪讲学，正欲上不得罪于圣贤，中不误于一己，下不为来者之害，如此而已，外此非所敢与。”^⑦

然而，时隔久远，语言习惯变化，使得古代圣贤所传之道晦而不明，即便是汉唐北宋诸大儒，发明经旨有准确的，也有不精确者，不能回避“诸先生立言有差处”^⑧的问题。朱熹最担心“经不正，理不明”^⑨，于是终身只做“明经正道”的工夫，对孔孟周程的言论作出尽可

① 《语类》卷 109，第 2697 页。

② 《语类》卷 11，第 188 页。

③ 《语类》卷 118，第 2850 页。

④ 《语类》卷 14，第 260 页。

⑤ 《语类》卷 116，第 2794 页。

⑥ 《语类》卷 114，第 2756~2757 页。

⑦ 《语类》卷 107，第 2671 页。

⑧ 《语类》卷 11，第 190 页。

⑨ 《语类》卷 9，第 152 页。